

福山與德里達的 「歷史終結論」之辯

● 朱紅軍

歷史事件的巧合，往往蘊藏着某種有趣的聯繫，以激發世人延展的想像，並成為公眾津津樂道的話題。2003年3月8日至19日，美國日裔學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以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教授的身份，完成了為期十天的對華學術交流活動。這不禁令人憶起在福山訪華之前，另一位也是來自西方並同樣享譽世界的哲學家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的中國之行。兩位國際著名學者幾乎沿着同樣的軌迹，交遊於中國的京滬寧三地，帶來的卻是關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解構學與中心論。

基於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迥異的審視姿態，兩種聲音的悲觀與樂觀論調在叩響中國學界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進行着某種跨越時空的碰撞，而我們的視線也在這鏗鏘入耳的碰撞聲中，自然地回到了十多年前那場發生在兩位著名學者之間的辯論，圍繞福山「歷史終結論」而展開的福音和幽靈之間的對話。

一 緣起與背景

1988年，芝加哥大學民主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主任布盧姆 (Allan D. Bloom) 出面，延請時任美國國務院官員的福山演講，他的主題是西方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已經在冷戰中永久性地大獲全勝，人類發展由此達到極致，即所謂「歷史的終點」。一年之後，1989年已是美國國務院思想庫副主任的福山，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期刊《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上發表名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的論文，正式拋出了「歷史終結論」。

最初，這篇宏大敘事有餘而縝密推理不足的論文，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連《國家利益》雜誌的主編哈里斯 (Owen Harries) 對之也持保留態度。轉機出現在不久之後戲劇性上演的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事件中，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夜之間尋得了現實依據，從而成為當時正處於迷茫之間的東西方世界尋求合理解釋的福音。

1992年，福山在此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自己的觀點，撰寫並出版《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在書中，他向全世界宣讀這份來自西方的福音：80年代世界上發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並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更是歷史自身的終結，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他看來，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它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

但是福山這種「歷史終結於當代」的論斷，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事實上構成了為美國政府張目的用意，其露骨的政治傾向及溢於言表的西方中心論調，被當時學界斥之為放棄自覺的學術立場的媚俗舉動。以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為代表的學者紛紛從學理層面對之進行批駁，其中尤以德里達的批判最猛烈，也最精到。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1993年4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思想與社會中心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討論馬克思主義在全球化語境中的位置和命運問題，德里達應邀參加。他在會上以一位「非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發表題為「馬克思的幽靈」的發言，指出馬克思理論或者說馬克思主義不止一種，而是有多種，它們和作為其建制形式的社會主義一樣，都是由特殊的歷史傳統所規定或確定的。因此，某一特定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形式的崩潰或「瓦解」，並不必然地意味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本身的終結。德里達顯然是被福山「別有用心」的煽動性理論激怒了，不僅指名道姓，而且言詞極為尖銳苛刻，甚至將福山理論的流行與廣為接受，喻為「當戰爭爆發的謠言初傳來時，家庭主婦搶購當時貨架上所有的食糖與黃油的情形」^①。之後，德里達又根據此次發言擴充而成《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s de Marx*)一書，並且依然保留了大部分篇幅批駁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向以解構思想著稱的德里達於某程度上卻在維護着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權威理論，因此有人將其所為視作向馬克思主義致敬。

一場圍繞福山「歷史終結論」，各有理論著作依託的福音與幽靈之間的對話就此展開，並且十餘年間持續發生影響，堪稱當代學術史上一場罕見的閃耀着真知灼見的論戰。

在福山來華之後，我們重新回歸十一年前那場學術巨擘之間的對話，當中的過激言辭及牽強附會之處，對於兩位著名學者所採取的立場背後真實意圖的揣測都已經不再重要，進入我們視野並且依然鮮活的，則是散見於其立論與駁論之間的尖銳性與深刻性。

二 前提之辯：當下資本主義鏡像的美好與衰敗

雖然福山在強調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勝利的同時，也承認「目前的勝利並不代表以後再也沒有事情發生，目前的自由主義還只是在思想或意識領域內取得勝利，離在現實的物質世界的勝利還很遠」^②。但在這種對勝利之途的艱辛估計的同時，其對於資本主義鏡像的當下美好及業已勝利的定性則是毋庸置疑的。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對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業已取得勝利的認定，成為福山「歷史終結論」中西方思想普世化的立論基石。

德里達並沒有拘泥於福山理論中細枝末節的推敲，而是甫一開場，便直擊「歷史終結論」的理論基石。用他的話說，福山所認為業已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自由世界，其實「滿目皆是黑暗，威脅與被威脅」。並由此斷言，這一福音其實是立論於可疑和充滿悖論的根據之上。為此，德里達列舉了諸如經濟戰爭、文化和宗教衝突、種族主義等等眾多資本主義的病態社會現象，並聲稱資本主義的衰敗「正在擴展並且自行生長」。外在於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中的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體現出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尊重，並精到地將其歸結為一種「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在他對資本主義罪惡的批判中，似乎能清晰的體現出，這種尊重已不僅僅停留在話語層面，而且已部分內化為解構立場。

福山於2003年3月13日在南京大學舉行的首次公開演講中，並不諱言其理論在現時國際環境中所遭受的種種挑戰，其中一條即是某些國家因為傳統的原因，比如公共行政的孱弱而

導致無法實現自由民主。這應該視為其近年來對於德里達所述的資本主義弱點的關注，並有意識地對自己理論作部分修正。但福山並沒有就此妥協，而是繼續頑強地將這一挑戰歸於偶然性和個別性，並不會影響其理論在更大範圍內的普世性。

但在德里達當年的批駁中，也即其對當下資本主義制度罪惡的認定中，並沒留有哪怕一絲的迴旋餘地，他將這種福山眼裏的偶然性歸納進了資本主義世界本質屬性的範疇，「這種失敗與斷裂，也先天地由於其定義而成為所有民主，包括最為古老和最為穩定的所謂西方民主的特徵。」

對於資本主義當下鏡像定性的決然分野，使得這場福音與幽靈之間的對話一開始便顯得針鋒相對；這已不僅僅是二者對於西方世界悲觀或樂觀態度區別這麼簡單，而是基於不同立場理性運用的必然結果。

三 模式之辯：理想福音與現實福音的懸置

十多年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被簡化成一句時髦的流行語，在每一次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之後，比如海灣戰爭，從學界到普通民眾都會不無習慣地問上這麼一句：歷史真的終結了嗎？

接受面的泛化也意味着遭遇挑戰機率的增加，事實上福山的理論也一直在實踐中不斷被證實或證偽。尤其是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常常使得歷史終結論的命題顯得撲朔迷離。「九一一」事件之後，西方曾經就有媒體以「福山的終結」為標題，直斥歷史終結論的虛妄。當年宏觀敘事的理論不

得不具體到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細節中去考察。

福山的此次中國之行，正是出於對「九一一之後，世界歷史是否真的終結？」這一昔日命題在新形勢下的回應。他試圖說明，「歷史終結論」堅持了十多年，雖然遭遇了嚴重挑戰，但並未導致理論體系的死亡，相反，有利於此種理論的事實範例層出不窮，比如東亞地區的經濟奇蹟，以及伊朗新一代青年中對於自由民主的嚮往等等。

對十餘年來現實中遭遇的種種挑戰的化解，表面上看是進一步論證了其「歷史終結論」的合理性。但正如德里達當年就指出的那樣，福山依然不能正面說明，為甚麼民主自由制較之其他體制是唯一的選擇？福山至今給出的答案仍大多停留在現實層面的解讀：對西方世界現時自由民主制的肯定，對西方以外世界趨向自由民主制的欣喜，以及對反自由民主制國家在經濟政治上的困境和失敗的論述。

在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一書的批判章節裏，便是其理論中對於現實層面的福音與理想層面的福音的懸置。即福山總是根據甚麼時候有利於自己和自己的觀點，一會兒把自由民主主義為實際的現實，一會兒把自由民主制定義為一種單純的理想，而始終無法正面尋找出從現實指向理想的必然之途。

福山在南京大學的演講中，提及目前西方世界因為伊拉克問題而產生的巨大分歧；拉美地區以阿根廷為代表的國家在實行自由民主制後曇花一現似的繁榮，他不得不承認這些均對其理論構成了巨大挑戰；但旋即又指出，所有這些事件或現實的累積決不會改變大部分人類是走向自由民主制

的理想方向。顯然，此處的自由民主制已經作為一種終極單純的理想福音。德里達揭示出，一旦存在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惡使得現實層面的福音無法解釋時，理想的福音便會出世以圓其說，而始終未見福山對這兩者之間的通途進行某種可行性的闡述。依照德里達的觀點，一旦聆聽者追問福山，憑甚麼斷言，這些事實的累積不能改變自由民主的大方向時，這一理想中的福音便多少顯得有如口號般的虛弱。

在被問及在像新加坡這樣集權甚於自由民主的國家裏，照樣可以將經濟建設得有聲有色時，福山給出的回答是：集權制國家短期內可能在經濟建設方面處於優勢，但它無法解決繼承的問題，即無法保證繼任政府一如既往地經濟建設上行之有效。這種對將來時態可能性的揣測，卻被他作為論證自由民主制終將普世化的必然證據。在德里達眼裏，福山似乎又一次「在耍詭計，玩花招」。

四 本質之辯：歷史的終結與歷史觀的終結

在福山之前，有兩位哲學家曾談論過「歷史的終點」，這就是馬克思和黑格爾(G. W. F. Hegel)。他們都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延續，而是在人類完成一個社會形態，一旦這個社會形態會滿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時，就會終結，換言之，他們都默認了一個歷史終結的存在。不同的只是，黑格爾以為的終點是自由國家，而馬克思則認為是共產主義社會。

福山並不諱言，自己的歷史終結論得益於黑格爾歷史觀的營養，從這

一點上說，德里達批判其偷運黑格爾歷史觀就顯得有扣帽子之嫌。正像福山自己強調，歷史對他來說，不是指過去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而是能把重要事件從不重要事件中分離出來的一種「抽象」，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到歷史以外去尋找一種永恆的跨歷史標準。顯然，福山和黑格爾一樣把歷史看成了某種「精神」和「意識」展現和實現自我的過程。精神一旦得到完全的展現，歷史必將終結。

這和其《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對於人類生存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認可與榮譽的論斷不謀而合。在福山看來，現實的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和非自由民主體制的社會均面臨同樣的巨大困境：人們在其中無法獲得真正的精神滿足感。一旦自由民主完善到使得這種精神滿足感得以真正實現，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制度和準則就無法進步了，也意味着終結。

德里達洞悉此點，一語中的地揭露出了福山這種唯心主義歷史觀，歷史的終結其實只是歷史觀的終結。其所謂的超歷史標準，即用以衡量政治制度好壞的標尺，實際上就是人的精神滿足感，而問題是人的精神滿足感是無法量化或定義的。福山以為的一種永恆標準，其最終還是落腳在並不永恆的基石上。

雖然德里達當年的演講題為「馬克思的幽靈」，但他並沒有運用太多的馬克思主義唯物歷史觀去批駁福山，他聰明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切於時勢而興，那就乾脆指出其在現實世界中的無效性。因此，德里達指出，福山這種以超歷史標準為基礎的自由民主理念，實際上只是一種無限的承諾，「永遠不會存在的事物以完全在

場的形式來臨」，它留給人們的只會是遙遙無期的等待。「從根本上說就是不可規定的救世希望，就是事件、個體以及不可預測的他者來臨的末世學關係。」

歷史確實會走向終結的那一天，但絕對不是現在就實現終結，也不會在福山所謂的當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國家那裏實現終結。那時「某一關於歷史的被規定了的概念終結了，但真正歷史的歷史性開始了；人的某一被規定了的人的概念終結了，但另一種人的，作為他人的純粹的人性最終獲得了」。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德里達最終闡述了他所謂的歷史終結觀點，解構主義的思想大師，在通篇批判解構福山觀點的同時，總算還給讀者一個模糊的結構。但面對德里達咄咄逼人的批判言辭，也許會有人質疑，為甚麼允許你德里達式地解構「西方中心論」，卻不允許福山式地解構共產主義？在德里達那裏，這還真是一個有趣的悖論。

註釋

① 文中所用德里達原話均引自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著，何一譯：《馬克思的幽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② 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

朱紅軍 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曾於《中華讀書報》、《東方》、《文藝報》、《中國文化報》、《人物》等刊物發表多篇文章，如〈諾貝爾文學獎的猶太情節〉、〈文學視野之外的莫言〉等。